

群体认同在集群行为中的作用机制*

殷 融 张菲菲

(潍坊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61)

摘 要 在集群行为背景下, 群体认同对个体的集群行为意愿既具有直接的动员作用, 同时也可以调节群体情绪和群体效能变量与人们行为意愿间的关系。政治认同、共同认同与双重认同等特殊形式的群体认同对集群行为的发生具有不同的影响。从动态性研究的角度看, 参与集群行为会强化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感, 而强烈的群体认同则会对参与者的行动产生持续影响。今后的研究应根据集群行为的不同触发情境、不同形式及不同发展阶段对群体认同的复杂工作机制进行探讨。

关键词 集群行为; 群体认同; 群体效能; 群体情绪

分类号 B849:C913

集群行为(collective action)是指群体成员参与的以改善群体现状为目的统一行动(Wright, Taylor, & Moghaddam, 1990)。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学者都曾从不同视角对集群行为进行过阐释与解读。相比于其他学科, 心理学研究更加关注的是集群行为的心理机制, 如参与者的动机、情绪及认知过程。过去 20 多年间, 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对集体行动¹中的参与者进行观察和研究, 逐渐发现一些动机变量, 正是这些变量激发着个体投身到集体行动中。

集群行为涉及的是群体间的冲突, 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作为群体成员的核心心理特质(Tajfel & Turner, 1979; Tajfel, 1982), 在集群行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内学者在关于集群行为的综述或实证研究中曾多次涉及到这一变量。本文主要系统总结群体认同对集群行为的心理动员机制, 梳理集群行为背景下群体认同的特殊化形

式, 介绍当下集群行为领域关于群体认同的动态性研究, 并对今后与之相关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1 集群行为领域的群体认同研究概述

群体认同是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最常被提及的概念之一, 它反映了个体将群体成员身份整合进自我概念的程度。根据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群体认同源自于人类的两个基本动机: 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和减少不确定性(uncertainty reduction)。自我提升是指个体会希望通过群体间的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来肯定内群体相对其他群体的优势, 从而获得自尊提升。而减少不确定性则是指个体通过掌握群际区别与群体特征, 可以更好的感知及预测他人的行为(Hogg, 2000)。群体认同是一个人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认同理论认为, 个体会自动地将人进行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 并明确自己所属的群体, 以所属群体身份定义自我(Tajfel & Turner, 1979)。个体对群体身份的觉知、对群体的心理归属感及对群体共享价值信念的肯定都是群体认同的构成要素。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 许多群体现象都与群体认同密切相关, 如内群体偏爱、外群体贬损、群体刻板印象、种族中心主义、群体合作和利他主义等(Tajfel, 1982)。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越高, 自我概念中的群体性与社会性越发凸显, 就会越倾向于以群体成员的身

收稿日期: 2014-11-27

* 潍坊学院博士基金资助项目(2015BS18)。

通讯作者: 殷融, E-mail: yorkns@sina.cn

¹ 国内对“collective action”常见的翻译方法有“集体行动”与“集群行为”两种, 目前没有学者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定义, 且在相关论文中存在这两者通用混用的先例, 本文在题目上使用了集群行为这一翻译方式, 但在正文某些部分, 为了符合中文表达的流畅习惯, 也使用了“集体行动”这一翻译方式。

份行事,表现出与群体身份相符的行为。

在集群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是集群行为的心理动员机制,即哪些因素会促使人们投身到集体行动中去(陈浩,薛婷,乐国安,2012)。因此,当涉及到群体认同变量时,研究者往往将其作为一种预测源,考察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水平是否会影响到他们参与集群行为的意愿(van Zomeren, Spears, Fischer, & Leach, 2004)。在此研究取向,情境实验法是最为常见的研究范式:研究者通常选取特定的群体如学生、有色人种、穆斯林教徒等作为被试,并向他们呈现真实的社会背景事件,如政府上涨学费、有色人种遭到歧视,或虚拟设定某种群体困境(内群体遭遇不公对待)。之后研究者再调查被试的群体认同等心理因素的强度水平,观察他们的集群行为意愿或实际行动,并将所得数据结果进行建模分析,以获得各个变量间的逻辑关系(van Zomeren, Spears, & Leach, 2008)。其中,涉及到群体认同变量时,研究者可以直接测量被试的群体认同感,常见的问题如“XXX这个身份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以身为一名XXX为荣”、“我喜欢XXX这个身份”(张书维,王二平,周洁,2012)。也可以将群体认同作为一个操作变量,通过社会身份外显启动法(如要求被试对自己的群体身份进行描述、思考自己与群体成员的相似性、想象内群体的共同遭遇等, Glasforda & Dovidio, 2011)或内隐启动法(如将特定的身份类别隐蔽在图片或词语判断任务中,薛婷,陈浩,乐国安,姚琦,2013)凸显被试的群体认同感。

除情境实验外,也有一些研究者会对实际发生的集群事件进行纵向追踪研究,通过对一次或数次的集群行为进行现场观察和挖掘,研究者可在自然情景中对人们心理状态进行即时记录,以此来描述群体认同及其他心理因素在集体行动爆发中的作用(de Weerd & Klandermans, 1999; van Stekelenburg, Anikina, Pouw, Petrovic, & Nederlof, 2013)。另外,近年来很多心理学家开始关注集群行为心理机制的动态性特征,在这一研究取向,群体认同不再被仅仅视为一种行为的预测因素,心理学家开始将群体认同作为一种反应变量,探索集群行为过程中个体群体认同感的动态演变性。

2 群体认同对集群行为的动员机制

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大量研究证明,群体认同

与群体成员的集群行为参与意愿或实际行动间具有高相关性,个体对某一群体的认同感越强,就越有可能代表那一群体参与集体抗争行动。群体认同对集群行为的预测作用已在工人罢工(Kelly & Breinlinger, 1996)、妇女反性别歧视活动(Iyer & Ryan, 2009)、宗教团体抗议(Tausch et al., 2011)、反战运动(Iyer, Schmader, & Lickel, 2007)、学生请愿(Tausch et al., 2011)、同性恋集会(Stürmer & Simon, 2004)、少数民族示威游行(Simon & Ruhs, 2008)等诸多种类的活动中得以验证。在众多关于集群行为的模型中,研究者都将群体认同作为最重要的核心变量(van Zomeren, Leach, & Spears, 2012; 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具体来看,群体认同对个体的集群行为意愿既具有直接的动员效应,同时也可以通过影响其他心理变量发挥作用,调节这些心理变量与人们行为意愿间的关系。

2.1 群体认同影响群体困境下个体的应对视角

众所周知,集群行为是在特定的情境(context)下产生的。所谓“情境”,是指触发集群行为的社会背景的统称。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对群体身份的认同常处于潜伏状态,其凸显有赖于情境的变化。在特定事件(如内群体遭受不公对待)的刺激下,个体的群体性身份凸显并会体验到群体相对剥夺(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但这些条件尚不足以直接引发个体参与群体反抗行动。原因是个体可以选择在整体群际关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个人努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取实际利益。但如果个体对内群体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和紧密的心理联系,群体利益会内化为自我利益,而群体遭遇的困境与挑战也会内化为个人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便会选择基于群体成员的身份进行应对(van Zomeren et al., 2012)。因此,群体认同会影响个体面对群体困境时的应对视角选择,在集群行为动员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高群体认同会使内群体成员准备好以群体的姿态进行行动,而在适当的情境下,这种准备状态就会转化为实际行动(Klandermans, 2014)。当然,这并不表示高群体认同是人们参与集群行为的必要条件,研究表明,从得失损益计算(cost-benefit calculations)的角度看,即便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较低,但只要他们认为集群行为是有效和有益的,便仍然有可能参与其中(van Zomeren et al., 2012)。

2.2 群体认同影响行动一致性

群体认同的强度既决定了个体在面对群体困境时的倾向性(即个体是否会在群体层面上进行应对),也决定了个体行为模式与典型群体成员的一致性。强烈的群体认同会导致个体的行为倾向更容易受群体行动的影响。当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时,群体信念与目标引发个体共鸣的可能性也为之增大,个体会倾向于像群体的典型成员那样去行动;同时,为了遵守内群体规范,个体也会表现出行为趋同模式(Blackwood & Louis, 2012; Simon, 2011)。一些研究显示,在特定群体认同凸显的条件下,即使群体相对剥夺水平较低,个体参与集群行为的意愿也会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张书维等, 2012)。也就是说,当个体对内群体认同感较为强烈时,即便他们并不认为内群体处境艰难,也依然愿投入到相关的群体抗争行动中去。甚至很多情况下,参与集体行动只是个体证明其群体成员身份、满足其心理归属感的一种手段(Mannarini & Fedi, 2012)。例如, Bäck, Bäck 和 Garcia-Albacete (2013) 的研究就曾证明,对社会拒斥较为敏感的个体会出于被内群体所认可的需要而支持集体行动,即便他们认为这一行动不会取得任何成效。这反映了群体认同对个体参与集群行为的诱导作用:个体对某一群体的认同感越强,就越有可能出于对群体的义务与责任感投身到集体行动中。

2.3 群体认同强化群体情绪与群体效能

群体认同不仅对集群行为有独立的动员作用,同时还可以通过作用于其他重要的心理变量而影响人们参与集群行为的意愿。在集群行为研究领域,群体情绪(group-based emotions)和群体效能(group efficiency)与群体认同一起被视为影响个体参与集群行为的三大前因变量(陈浩等, 2012; 弯美娜, 刘力, 邱佳, 杨晓莉, 2011)。“群体情绪”具体指个体针对特定事件基于群体成员身份而产生的情绪反应(Smith, 1993)。当群体积累了强烈的愤怒情绪时,就有可能爆发集群行为。“群体效能”概念则指群体成员对通过共同努力能够实现群体目标的信念(Bandura, 1997),当人们相信群体有能力改变当前境遇时,发起集群活动的可能性就随之增大(张书维, 王二平, 2011)。van Zomeren 等(2008)在对 182 篇涉及集群行为中认同感、效能感和情绪的文献进行元分析后,提出了一个整合的

集群行为群体认同模型。根据该模型,群体认同机制既作用于群体成员的情绪体验,也会调节个体的效能评估过程。其中,群体认同能作用于群体情绪,是因为它提供了不公体验的群体分享基础,可以影响人们在经历不公事件时的情绪反应,提高群体成员情绪体验的趋同性(Smith, Seger, & Mackie, 2007; Yzerbyt, Dumont, Wigboldus, & Gordijn, 2003)。个体的群体认同感越强,就会越容易在群体遭受不公时体验到群体愤怒情绪,进而在情感上被激发参与集体行动。而群体认同能作用于群体效能,是因为强烈的群体认同感会引发个体对内群体更积极的印象,影响个体对群体成员团结性与凝聚力的觉知,进而提高个体对群体能力的评估(Cakal, Hewstone, Schwar, & Heath, 2011; van Zomeren et al., 2012)。因此,在影响个体参与集群行为的三大变量中,群体认同具有更加重要的中枢地位。

2.4 群体认同调节情绪与效能对行为意愿的影响作用

群体认同不仅对愤怒情绪与群体效能具有驱动作用,还会调节这些变量与个体集群行为意愿间的影响关系。根据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dual pathway model),个体可由两条心理路径表达集群行为的意愿:一是基于愤怒感受的情绪聚焦(emotion-focused)路径,一是基于效能计算的问题聚焦(problem-focused)路径(van Zomeren et al., 2012; van Zomeren et al., 2004)。研究者认为,这两条路径是相对独立的,但其效应的发挥都会受到群体认同的调节。其中,当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感较强时,问题聚焦路径的预测作用就会降低,因为高水平的群体认同提高了个体在背叛群体时的心理成本,影响到了个体的损益理性计算过程,此时,群体愤怒可能是导致集群行为的主要原因。而当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感较弱时,个体可能并不会因群体遭遇不公事件而体验到强烈的愤怒感,此时,问题聚焦路径的预测力则凸显出来,群体成员只有在预期群体行为能够取得较好效果的情况下,才会愿意参与到集体行动中。除此之外,也有研究发现,当集群行为的具体形式涉及到较多的个人牺牲时,个体只有首先将自己强烈的认同为群体的一份子,才会进一步依据效能评估决定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否则他们更可能采取自我应对策略,这也反映群体认同在群体效能与

集群意愿间重要的调节作用(Shi, Hao, Saeri, & Cui, 2014)。

3 群体认同的特殊形式

在传统的集群行为研究领域,群体认同一般指个体对自己所从属的正遭受不公境遇的弱势群体的认同。然而,个体的社会身份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集群行为背景下群体认同可能会具有一些特殊化形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关注这些集群行为中的非典型性群体认同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群体认同可能会对集群行为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3.1 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politicized identity)指个体对某一社会运动或运动组织的认同(Stürmer & Simon, 2004)。在集群行为背景下,内外群体并不一定以明确的具有社会意义的身份类别(如学生、工人、艾滋病患者等)为边界。根据 McGarty, Bliuc, Thomas 和 Bongiorno (2009)提出的观点群体(opinion-based group)理论,集体行动中所谓的“群体”可以是广泛意义上具有共同信念、价值观或权益诉求的政治团体,参与者是基于新形成的观点内群体去行动的,例如,在美国除黑种人、黄种人等少数族裔外,白人也可能持种族平等观点;再如,同性恋也可能是反歧视同性恋活动的参与者。研究表明,政治认同在集群行为动员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且相比于对更广泛社会群体身份的认同(如工人、同性恋),个体对某一运动或组织的认同感(如工会、同性恋运动)可以更好的预测他们的行动参与倾向(Blackwood & Louis, 2012; Klandermans, 2014; van Zomeren et al., 2008)。

政治认同可以为优势群体的集群行为现象做出解释。从工具理性的视角看,个体只有在自己或群体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参与集体行动。然而,现实生活中常有一些在社会群际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选择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行抗争,但他们并不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且他们的行动反而有可能危害到所属优势群体的地位,这种现象即优势群体集群行为。优势群体之所以愿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持帮助,正是因为他们与弱势群体成员具有共同的政治认同,即当优势群体成员认同弱势群体的价值观、道德信念和奋斗目标时,更有可能为了改

善弱势群体的权益而发动或参与集群行为。例如, Wiley, Srinivasan, Finke, Firnhaber 和 Shilinsky (2012)的研究证明,男性被试越认同女权主义思想,他们参与反性别歧视运动的意愿也就越强烈。

3.2 共同认同

共同认同(common identity)指相较于较小的内群体,个体对包摄水平更高的群体身份的认同。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并不是只有一种社会身份,可以同时属于多种社会群体并拥有多重社会身份,而不同的群体身份间可能会具有上下包摄关系,如“藏族人”、“汉族人”等群体身份就从属于“中国人”这一群体身份。根据 Gaertner 和 Dovidio (2012)提出的共同内群体身份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当个体将原来两个分离群体的认知表征改变为一个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superordinate group)时(例如,由“藏族人”与“汉族人”这样的认知表征改变为“中国人”的认知表征),个体会以共同身份的方式重新界定内外群体,共同认同得以凸显,此时原本存在的内外群体的边界会弱化,个体会减轻对原有外群体的偏见、不满及敌意,增加对原有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

在集群行为背景下,加强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会提高个体的行动参与意愿。然而,共同认同与行为意愿间则具有相反的效应关系。Glasforda 和 Dovidio (2011)认为,当内群体与集群行为指向的外群体都从属于更高的上位群体时,凸显这种共同身份可以转移亚群体(subgroup)成员对当前群际差异的关注,减轻个体因群体不利所产生的愤怒情绪,进而降低群体成员为亚群体进行抗争的意愿。该假设在不同社会背景下都已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研究者对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印度的穆斯林教徒等社会边缘群体进行研究发现,强调共同身份可以减少被试对偏见的觉知,并进而降低他们对社会改革运动的支持(Saguy, Tausch, Dovidio, & Pratto, 2009; Saguy, Tausch, Dovidio, Pratto, & Singh, 2011)。Glasforda 和 Dovidio (2011)以在美国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学生(拉丁、非洲后裔)为被试进行实验证明,向被试凸显共同认同(对美国的认同)后,被试改善群体局面的动机降低,同时他们对未来的群际关系会有更乐观积极的态度。Ufkes, Dovidio 和 Tel (2015)则以欧洲的库尔德族人为被试进行研究发现,向被试展示关于库尔德族人在社会经济

结构方面的不公正遭遇后,对“欧洲人”这一上位群体身份认同感较强的被试因此体验到的愤怒感会较弱,同时他们参与集群行为改变族群地位的愿望也会较低。

3.3 双重认同

双重认同(dual identity)是指个体同时具有对上位群体身份(superordinate identity)与亚群体身份(subgroup identity)较强的认同感(González & Brown, 2003)。其中,亚群体认同往往涉及到个体对民族、宗教的认同;而上位群体认同则往往涉及到个体对国家、地域的认同。研究发现,对于个体来说,上位群体认同与亚群体认同并不必然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兼容并存的,这一现象多见于移民、少数民族等群体,如在一个亚裔美国人身上会既存在对美国的认同,也存在对亚裔身份的认同(Simon & Grabow, 2010; Simon & Ruhs, 2008)。

亚群体认同对集群行为具有基础动员作用,上位群体认同(即共同认同)对集群行为则具有消解作用,那么当这两种认同同时存在时,会对个体的集群行为意愿产生怎样的影响? Klandermans, Roefs 和 Olivier (2001)对德国的土耳其及俄罗斯移民进行研究发现,具有双重认同的移民者会更有可能是为了亚群体的利益参与游行活动。Martinovic 和 Verkuyten (2014)对德国和荷兰的穆斯林宗教团体进行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效应,即双重认同对人们是否参与抗议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个体对亚群体身份的认同会导致他们更愿意为了群体利益进行抗争,同时,个体对上位群体身份的认同(如国家认同)会使他们相信亚群体的不利处境理应得到合理解决,即双重认同将个体因群体困境产生的不满情绪(源自于对亚群体的认同)与抗争的权利感(源自于上位群体认同)结合在了一起,因而使个体认为自己应该且能够参与改善亚群体现状的集体行动(Simon, 2011; Simon & Klandermans, 2001)。与此解释相对应的, Klandermans, van der Toorn 和 van Stekelenburg (2008)对荷兰及美国的土耳其移民进行的调查研究证实,具有双重认同的移民者更倾向于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但当他们产生不满时也更容易参与集体抗争活动。Simon, Reichert, Schaefer, Bachmann 和 Renger (2015)对德国的土耳其及俄罗斯移民进行的比较研究则发现,只有亚群体在社会群际互动中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不公正对待时,双

重认同才会促使他们参与集体行动;如果亚群体成员并未因社会群际关系体验到很大不满,那么双重认同对他们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则不具有预测作用。

4 群体认同的动态性研究

集群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情境下的群际互动行为,是不同群体间相互作用的产物。群体成员是根据对社会关系和群体状况的理解来采取行动的,因此,在集体行动中,随着社会情境与群际互动的变化,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及行为倾向都会发生动态变化。过往社会心理学对集群行为的研究主要从预测的角度探讨人们参与集群行为的前因变量,近年来的研究则开始逐渐聚焦于集群行为的动态演变机制。其中,群体认同作为一种最重要心理因素,其在集群行为动态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格外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4.1 群体认同维持行动意愿

在传统集群行为研究领域,研究者往往以个体是否愿加入某一集体行动作为反映其参与意愿的指标,从动态性的视角来看,个体的参与意愿还可以体现在投入的持续性上。当集群行为爆发后,参与者会根据对抗争形势的评估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根据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与期望价值理论(expected value theory)等工具理性取向的理论,人们参与集群行为的目的在于改善内群体境况(Klandermans, 1984; McCarthy & Zald, 1977),因此,当集体行动切实有效时人们会持续投身其中,当集体行动失利时人们则可能畏步不前。然而, Blackwood 和 Louis (2012)的研究发现,认同感可以缓冲抗争失利带给个体的消极影响。他们对澳大利利益反战运动参与者的调查显示,随着事态的发展,对这一运动认同感较低的参与者评价抗议活动时主要基于该行动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但这种效应在高认同者群体中则不存在。这说明,对于高认同者来说,他们不会认为没有实际效果的抗议活动就是失败的,他们可能更为重视的是群体行动是否可以团结吸引公众、表达内群体的价值观与理想信念。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些旷日持久的集体抗争运动中,参与者常常在承受巨大的个人牺牲且收益渺茫的情况下,依然会坚持行动下去。与此相对应的, Mannarini 和 Fedi (2012) 对反全球化及反修路活动的参与者进行追踪研究也发现,参与者对群

体及运动的信念目标越忠诚,持续参与集体行动的义务感与责任感就越强烈。也就是说,当个体对内群体或群体行动有较高的认同感时,他们可以相对忽视自己在行动中实际利益的得失,并更愿意为集体行动付出长期的投入与承诺。

4.2 集体行动中群体认同的发展

在传统的集群行为心理学研究领域,群体认同被视为促使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主要动因,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集体行动并不仅仅是群体认同的产物,同时也会对群体认同感产生重要影响。Drury 和 Reicher (2005)指出,集群行为会对个体产生强化效应,在共同行动中,群体成员的身份得以凸显和确认,内外群体的界限进一步明确,群体凝聚力得以加强,信念目标得以巩固,个人与集体的心理联系会更加紧密。而这种体验则可以进一步激励群体成员投身到集体行动中去,促使他们为实现群体目标而努力。也就是说,在集群行为发展过程中,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与行动参与意愿间会形成一种循环因果链关系。

群体认同的动态变化性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例如,Drury, Cocking, Beale, Hanson 和 Rapley (2005)对英国 1993 年反修路活动的参与者进行访谈研究发现,抗议群体实际是在抗议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在与警察和建筑商的对峙过程中,参与者内部的凝聚力逐渐提升,他们对抗议活动的认同感得到强化,而这种体验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反路运动中的表现。Neville 和 Reicher (2011)对圣安德鲁斯大学反公寓改建计划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在抗议期间,部分参与者会认为他们与其他的抗议者有更紧密的心理联系,体验到更强烈的群体支持,这会进而巩固他们的信念,使他们愿为今后的集体行动付出更多的承诺。de Weerd 和 Klandermans (1999)以抗议欧盟农业政策的荷兰和西班牙农民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追踪研究发现,不仅个体对农民这一群体的认同感可以预测他们是否会参与集体抗议活动,同时他们是否实际参与抗议活动也可以预测之后的群体认同感变化。Miles 和 Catellani (2011)以意大利左派民主党的支持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发现,在内群体遭遇政治失利后,如果引导被试对结果进行外向归因,那么被试的群体认同感与效能感都会提高,并更愿意在今后继续参与支持内群体的行动。这些研究都说明,群体认同与集群行为之间

具有循环作用的机制,群体认同感是个体参与集群行为的直接动因,而参与集群行为又会强化当事者的群体认同感,激励其进一步投身到集体行动中去。

5 评价与展望

在集群行为研究领域,心理学家一直非常重视群体认同这一变量,在近 20 年进行了大量与之相关的研究。当前,研究者已初步阐明了群体认同与集群行为之间的关系,厘清了其中具体的作用机制,并开始从集群行为动态性发展的角度对群体认同进行探索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在该研究领域仍有一些重要问题未得到解答,今后的研究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与关注。

首先,过往几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集群行为中群体认同的一般性动员作用,尽管心理学家已将政治认同、共同认同、双重认同等特殊形式的群体认同引入到当前的研究框架中,但依然很少有研究对集群行为中不同层次的群体认同进行综合比较分析。薛婷等(2013)的研究曾证明,在集体行动中,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群体认同(如对大学生身份的认同)可以通过情绪及效能路径显著影响行动倾向,而关于集体行动组织方的认同(如对学校的认同)只通过效能路径显著影响行动倾向。这是因为,个体对群体身份的认识包含了与群体的情感联系,因此大范畴的身份认同会表现出感性兼具理性的内驱力特征;而个体对行动组织方的认识则包含了关于行动资源及利害得失的理性分析,因此小范畴的组织认同则主要表现出理性内驱力特征。也就是说,在集体行动中,不同层次群体认同对个体参与意向产生的影响可能具有一定差异性。除此之外,不同情境类型下群体认同对集群行为的动员作用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效果,例如,在内群体遭遇不公待遇但个体实际利益并未直接受损的情况下,个体只有真正对内群体抱有强烈认同感才可能参与集体行动,此时群体认同作为一种内驱动机就会是行为倾向更有效的预测源(张书维等, 2012)。因此,今后的研究应更多关注不同触发情境下、不同层次群体认同在集群行为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在差异化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不同变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复杂心理机制。

其次, 过往研究在探讨群体认同与集群行为之间的关系时, 没有区分集群行为的各种不同形式。在集体行动中, 群体成员的行为策略有多种模式可以选择, 如请愿、游行、非暴力不合作、暴力攻击等。Wright 等 (1990)对集群行为的激烈性、合法性与道德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后, 根据集群行为模式与社会规范的关系而将集群行为分为常规集群行为(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与违规集群行为(non-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 前者指符合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道德、法律、意识形态等既存规则的集群行为, 如和平游行、联合签字抗议等; 与此相对, 后者则指违背了这些规则的行为策略模式, 如冲击政府、破坏公物等。大量研究证明, 违规集群行为与常规集群行为的前因变量具有很大差异性, 在情绪维度上, 个体参与常规集群行为主要是基于群体愤怒情绪, 而个体参与违规集群行为则主要是基于对外群体的群体蔑视(contempt)情绪(Becker, Tausch, & Wagner, 2011; Tausch et al., 2011); 在效能维度上, 群体效能对常规集群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但对违规集群行为则具有负向预测作用(Thomas & Louis, 2013)。那么是否在不同类型的集群行为中, 群体认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动员机制? Klandermans (2014)曾指出, 极端的群体认同是暴力集群行为产生的重要条件。相比于常规集群行为, 违规集群行为需要参与者付出更高昂的成本与代价, 因此, 只有个体对群体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时才可能投身于此。然而, 当前却没有研究证明群体认同强度与违规集群行为间具有任何相关性(Simon, 2011)。尽管如此, Becker, Tausch, Spears 和 Christ (2011)的实验发现, 参与极端的集体行动后, 个体由于担心自己的行为不被群体成员所支持, 因而对大范畴内群体(学生)的认同感会降低, 但对极端行动本身的认同感则会提高。这说明, 群体认同与违规集群行为之间可能受多变量的中介影响, 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 今后的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这一方向。

再者, 过往关于集群行为的研究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其心理机制进行解释, 在这种研究取向, 群体认同感只是集体行动的前因变量。尽管近年来心理学家已开始关注集群行为的动态性特征, 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 但涉及到群体认同的研究大多只是对其动态变化进行简单描述。在集群行为的发展过程中, 个体所感知的

群体情绪状态及群体效能会在群际互动的作用下发生动态演变, 而这种变化就可能会受到群体认同变量的调节, 并进而影响到个体下一步的行动。例如, 当集体行动取得成就时, 如果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较强, 就可能更多地将行动的成功归因于内部原因(群体的力量、团结), 并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 效能信念得到强化; 而当集体行动遭遇挫折时, 如果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较强, 就有可能将行动失败归因于社会环境、偶然性等外部原因, 以维持对内群体的积极认同。McCrea (2007)对足球队员的研究就曾发现, 对球队认同感更高的被试, 会在球队失利后将结果更多的归结为媒体压力等外部因素。Tausch 和 Becker (2013)的研究则发现, 在抗议政府征收学费事件中, 学生对抗议运动的认同感越强、心理投入越高, 那么就更容易因集群行为的成功而感到自豪、因集群行为的失败而感到愤怒。因此, 今后的研究, 应更多地关注集体行动发展过程中群体认同对其他变量的调节作用, 通过多变量整合性研究, 更好的揭示群体认同与其他心理及行为因素之间的动态性相互作用。

另外, 除以上提到的问题外, 很多已有的具体研究结论实际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性。例如, 尽管很多数据都说明在集群行为背景下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但并没有足够的实验研究能证明群体认同会加强群体效能。相反, van Zomeren, Leach 和 Spears (2010)的研究发现, 通过呈现虚拟的专家意见提高抗议者的群体效能感后, 他们的群体认同会有显著的提高。研究者认为, 这是因为当个体知觉到内群体具有较强的能力时, 出于对自己进行积极评估的需要, 会更愿意将自己看作是群体的一员; 此外, 当个体具有较高群体效能时, 会更愿意为集体行动付出承诺, 在这种情况下也会与内群体有更紧密的心理联系。然而, 目前并没有更多的研究对此观点进行验证。而在集群行为的群体认同研究领域, 还存在很多同类型的争议性问题。因此, 今后的研究应更加重视对这些有争议的假设进行澄清, 通过合理的实验设计, 进一步构建出变量间更为清晰的逻辑关系。

参考文献

陈浩, 薛婷, 乐国安. (2012). 工具理性、社会认同与群体

- 愤怒——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0(1), 127–136.
- 弯美娜, 刘力, 邱佳, 杨晓莉. (2011). 集群行为: 界定、心理机制与行为测量. *心理科学进展*, 19(5), 723–730.
- 薛婷, 陈浩, 乐国安, 姚琦. (2013). 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的作用: 群体情绪与效能路径. *心理学报*, 45(8), 899–920.
- 张书维, 王二平. (2011). 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的动员与组织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19(12), 1730–1740.
- 张书维, 王二平, 周洁. (2012). 跨情境下集群行为的动因机制. *心理学报*, 44(4), 524–545.
- Bäck, E., Bäck, H., & Garcia-Albacete, G. (2013). Protest activity, social incentives, and rejection sensitivity: Results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about tuition fees. *Contention*, 1, 1–15.
-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Freeman.
- Becker, J. C., Tausch, N., Spears, R., & Christ, O. (2011). Committed Dis (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radical collective action fosters disidentification with the broader in-group but enhance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8), 1104–1116.
- Becker, J. C., Tausch, N., & Wagner, U. (2011). Emotional consequences of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differentiating Self-directed and Outgroup-directed emo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12), 1587–1598.
- Blackwood, L. M., & Louis, W. R. (2012). If it matters for the group then it matters to me: Collective action outcomes for seasoned activist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1, 72–92.
- Cakal, H., Hewstone, M., Schwar, G., & Heath, A. (2011).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sedative’ effect of intergroup contact among Black and White students in South Afric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0, 606–627.
- de Weerd, M., & Klandermans, B. (1999).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protest: Farmer’s protest in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9, 1073–1095.
- Drury, J., Cocking, C., Beale, J., Hanson, C., & Rapley, F. (2005). The phenomenology of empowerment in collective a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4, 309–328.
- Drury, J., & Reicher, S. (2005). Explaining enduring empower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5, 35–58.
- Gaertner, S. L., & Dovidio, J. F. (2012). Reducing intergroup bias: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In P. A. M. V. Lange, A. W. Kruglanski, & E. T. Higgins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439–457).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lasford, D. E., & Dovidio, J. F. (2011). E pluribus unum: Dual identity and minority group members’ motivation to engage in contact, as well as social chang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5), 1021–1024.
- González, R., & Brown, R. (2003). Generalization of positive attitude as a function of subgroup and superordinate group identifications in intergroup conta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2), 195–214.
- Hogg, M. A. (2000). Subjective uncertainty reduction through self-categorization: A motivational theory of social identity processe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1, 223–255.
- Iyer, A., & Ryan, M. K. (2009). Why do men and women challenge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place? The role of group status and in-group identification in predicting pathways to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791–814.
- Iyer, A., Schmader, T., & Lickel, B. (2007). Why individuals protest the perceived transgressions of their country: The role of anger, shame, and guil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 572–587.
- Kelly, C., & Breinlinger, S. (1996).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 Identity, injustice, and gender*. London: Taylor & Francis.
- Klandermans, P. G. (1984).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rade union action: An expectancy-value approach.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57(2), 107–120.
- Klandermans, P. G. (2014). Identity politics and politicized identities: Identity processes and the dynamics of protest. *Political Psychology*, 35(1), 1–22.
- Klandermans, B., Roefs, M., & Olivier, J. (2001). *The state of the people: Citizens, civil society and governance in South Africa, 1994–2000*. Pretoria, South Africa: Human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 Klandermans, B., van der Toorn, J., & van Stekelenburg, J. (2008). Embeddedness and identity: How immigrants turn grievances into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6), 992–1012.
- Mannarini, T., & Fedi, A. (2012). Persisting or withdrawing? An insight into the psychosocial processes underlying sustained engagement.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2(4), 300–315.
- Martinovic, B., & Verkuyten, M. (2014). The political downside of dual identity: Group identifications and religiou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Muslim minor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3(4), 711–730.
- McCarthy, J. D., & Zald, M. N.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6), 1212–1241.
- McCrea, S. M. (2007).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following negative outcomes: Evidence for group and self-protective

- bias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7, 1256–1271.
- McGarty, C., Bliuc, A.-M., Thomas, E. F., & Bongiorno, R. (2009). Collective action as the material expression of opinion-based group membership.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4), 839–857.
- Miles, P., & Catellani, P. (2011). The day after an electoral defeat: Counterfactuals and collective a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0, 690–706.
- Neville, F., & Reicher, S. (2011). The experience of 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Shared identity, relatedness and emotionality.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6(3), 377–396.
- Saguy, T., Tausch, N., Dovidio, J. F., & Pratto, F. (2009). The irony of harmony: Intergroup contact can produce false expectations for equal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 114–121.
- Saguy, T., Tausch, N., Dovidio, J. F., Pratto, F., & Singh, P. (2011). Tension and harmony in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P. R. Shaver & M. Mikulincer (Eds.), *Understanding and reducing aggression, violence, and their consequences* (pp. 333–348).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Shi, J., Hao, Z., Saeri, A. K., & Cui, L. J. (2014). The dual-pathwa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Impacts of typ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8(1), 45–65.
- Simon, B. (2011).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A. Azzi, X. Chrysoschoou, B. Klandermans, & B. Simon (Eds.), *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ly diverse societies: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pp. 137–157). Oxford, England: Wiley-Blackwell.
- Simon, B., & Grabow, O. (2010). The politicization of migrants: Further evidence that politicized collective identity is a dual ident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31, 717–738.
- Simon, B., & Klandermans, B. (2001). Politicized collective identi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 319–331.
- Simon, B., Reichert, F., Schaefer, C. D., Bachmann, A., & Renger, D. (2015). Du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De-) politicization of migrants: Longitudinal and comparative evidence.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5(3), 193–203.
- Simon, B., & Ruhs, D. (2008). Identity and politicization among turkish migrants in germany: The role of dual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6), 1354–1366.
- Smith, E. R. (1993).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emotions: Toward new conceptualisations of prejudice. In D. M. Mackie & D. L. Hamilton (Eds.), *Affect, cognition, and stereotyping: Interactive processes in group perception* (pp. 297–31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Smith, E. R., Seger, C. R., & Mackie, D. M. (2007). Can emotions be truly group level? Evidence regarding four conceptual criteri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3), 431–446.
- Stürmer, S., & Simon, B. (2004). Collective action: Towards a dual-pathway model. In W. Stroebe & M. Hewstone (Ed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5, pp. 59–99). Hove, UK: Psychology Press.
- Tajfel, H. (1982).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3–48). Monterey, CA: Brooks / Cole.
- Tausch, N., & Becker, J. C. (2013). Emotional reactions to success and failure of collective action as predictors of future action intentions: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tudent protests in German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2(3), 525–542.
- Tausch, N., Becker, J., Spears, R., Christ, O., Saab, R., Singh, P., & Siddiqui, R. N. (2011). Explaining radical group behavior: Developing emotion and efficacy routes to normative and non-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1), 129–148.
- Thomas, E. F., & Louis, W. R. (2013). When will collective action be effective? Violent and non-violent protests differentially influence perceptions of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among sympathiz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0(2), 263–276.
- Ufkes, E. G., Dovidio, J. F., & Tel, G. (2015).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among European Kurd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4(1), 176–186.
- van Stekelenburg, J., Anikina, N. C., Pouw, W., Petrovic, I., & Nederlof, N. (2013). From Correlation to Causation: The Cruciality of a Colle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1, 161–187.
- van Zomeren, M., Leach, C. W., & Spears, R. (2010). Does group efficacy increase group identification? Resolving their paradoxical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1055–1060.
- van Zomeren, M., Leach, C. W., & Spears, R. (2012). Protesters as “Passionate Economists”: A dynamic dual pathway model of approach coping with collective disadvantag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2), 180–199.
- van Zomeren, M., Postmes, T., & Spears, R. (2008). Toward an integrativ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 of three socio-psychological

-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 504–535.
- van Zomeren, M., Spears, R., Fischer, A. H., & Leach, C. W. (2004).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Explaining collective action tendencies through group-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5), 649–664.
- Wiley, S., Srinivasan, R., Finke, E., Firnhaber, J., & Shilinsky, A. (2012). Positive portrayals of feminist men increase men's solidarity with femini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7(1), 61–71.
- Wright, S. C., Taylor, D. M., & Moghaddam, F. M. (1990). The relationship of perceptions and emotions to behavior in the face of collective inequality.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4, 229–250.
- Yzerbyt, V., Dumont, M., Wigboldus, D., & Gordijn, E. (2003). I feel for us: The impact of categor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n emotions and action tendenc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2(4), 533–549.

The Mechanism of Group Identity in Collective Action

YIN Rong; ZHANG Feifei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Weifang University, Weifang 261061, China)

Abstract: Group identity has a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individuals' willingness of participating collective action, and also it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s of group efficiency and group-based emotions to action tendencies. Many special types of group identity such as politicized identity, common identity and dual identity could affect collective action in wide r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researches, undertaking collective action can strengthen protestors' identification for ingroup. And strong group identity will exert a sustained impact on protestors' behaviors.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the complex work mechanism of group identity on the basis of the differences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contexts, behavior pattern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Key words: collective action; group identity; group efficiency; group-based emotions